

上海中药材 东洋庄研究

*Shanghai Zhongyaocai
Dongyangzhuang Yanjiu*

翁其银●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前　　言

从 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上海曾经出现过南洋庄、西洋庄和东洋庄。所谓南洋庄是与东南亚诸国进行贸易的商号的总称, 所谓西洋庄是与欧洲诸国及美国等进行贸易的商号的总称, 所谓东洋庄是与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台湾进行贸易的商号的总称。

无论在国内国外, 关于前两者的研究都有较大的进展; 唯独关于东洋庄, 尤其是关于中药材东洋庄, 由于资料匮乏, 至今还没有人切实着手研究过。

出人意外的是, 80 年代中前期以来, 在日本长崎市新地镇一家华侨商社的地下室里, 陆续发现长崎泰益号及其姐妹店神户泰益洋行等 10 多家旅日华商的数万件商务信件和部分经营帐簿, 其中竟有 1/3 与上海东洋庄有关。笔者用了 10 年时间, 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整理、读解和分析, 逐步了解了东洋庄的内部结构及其大部分成员的贸易状况。

上海东洋庄大致上可分为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丝绸织品东洋庄、粮棉豆东洋庄、杂货东洋庄等。属于海产品东洋庄的 20 家左右的商号, 在习惯上又分为北市号和南市号; 前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北海道的函馆输入, 后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输入。长崎泰益号是以日本海产品出口贸易起家的, 它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属于南市号。

就规模而言, 中药材东洋庄比海产品东洋庄小, 但其成员却比较多, 其中专业的药行有 20 多家, 洋行有 2 至 3 家, 兼业的商号有

7至8家，共有30多家。中药材的消费者除了在日的华侨华人外，主要是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居民。但是，由于税收关系，药材不是从上海直接运往台湾，而是绕道长崎（或门司），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上海→长崎（或门司）→台湾间三角形的中药材贸易途径。中药材贸易中介商是长崎泰益号。该商社把海产品运至上海批发，将中药材运到门司港或长崎港转口台湾。因此，当年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写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及泰益号有关的经营帐簿，不仅是研究海产品东洋庄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中药材东洋庄的唯一可靠的资料。笔者自1989年以来，通过分析其中的大部分资料，写出关于东洋庄，特别是关于上海、长崎、台湾间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论文20多篇，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广泛关注。拙书《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就是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概括、改写、补充而成的。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是在日本侵占我国固有领土台湾，以排外性的、片面性的、掠夺性的高关税政策，阻隔台湾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曾经存在大约30年之久，却没有在当时中日两国的新闻报纸和学术著作里留下其笔迹，也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投下其影子。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能采用单纯的逻辑推理的方法，而要同时兼用统计学的方法、实证研究的方法。笔者从泰益号现存的一万五千多件上海商号的信件中，筛选出与中药材东洋庄有关的五千多件，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判明进出口商的名称、地址、经营者，统计进出口药材的品种、价格、数量以及税收等，并总结贸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借以窥探半个世纪前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全貌。也就是说，兼用统计学的方法、实证研究的方法是本书写作上的重要特点。

本书由8章组成。第一章概述在长崎发现的旅日华商泰益号商务资料群的构成及其对上海东洋庄研究，特别是对上海中药材

东洋庄研究的意义。第二章简述长崎泰益号的经营改革与上海中中药材东洋庄的兴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介绍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成员构成及其在台湾的贸易对象。第四章至第六章重点论述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三大出口主角裕孚系药行、鼎成系药行、乾康药行,浙江帮经营的协成元记药行、同康药行,作为国际贸易商社的晋和洋行、裕孚洋行的各自特征及其在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中的作用。第七章对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的中药材加以分类和概括。第八章对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中的各种贸易磨擦、偷税逃税问题和它的没落原因进行剖析。

书中所附的有关中药材贸易的数据和统计表等,都是作者亲自从泰益号大量的商务信件和经营帐簿中整理出来、尚未被他人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全书的内容也不见于国内外他人的著作。

应该指出,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只是笔者刚刚着手开垦的“处女地”,还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成果;但是,从某一角度看,拙书的出版将填补近代东亚中药材贸易史和近代旅日华侨贸易史等的一个空白。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在长崎发现与上海东洋庄有关的资料群	1
第一节 泰益号资料的构成状况及其特征	2
第二节 泰益号商务信件在上海中药材东洋庄 研究中的作用	9
第二章 泰益号的经营改革与中药材东洋庄的兴起	22
第一节 旅日华商长崎泰益号的经营改革	24
第二节 泰益号在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中的作用	31
第三章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概况	41
第一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主要出口商	41
第二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主要贸易对象	51
第四章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商的三大主角	72
第一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裕孚系药行	73
第二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鼎成系药行	86
第三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乾泰药行	96
第五章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浙江帮经营者	108
第一节 在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中与闽南帮的协作	108
第二节 富有特征的浙江帮协成元记药行	119
第三节 实行特殊经营战略的浙江帮同康药行	127
第六章 中药材东洋庄中的国际贸易商社——洋行	141
第一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晋和洋行	143

第二节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中的裕孚洋行	148
第七章	中药材东洋庄出口药材的分类	159
第一节	中药材东洋庄出口的治疗药	160
第二节	中药材东洋庄出口的补药	169
第八章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没落	185
第一节	中药材交易过程的纠纷及其激化	186
第二节	进出口报关时的偷税逃税及其恶果	194
结论		205
附录		216
一、	裕孚系药行出口中药材的统计	216
二、	鼎成系药行出口中药材的统计	226
三、	乾泰药行等出口中药材的统计	237
四、	浙江帮经营的药行出口中药材的统计	249
五、	国际贸易商社——洋行出口中药材的统计	267
六、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中药材的单价与税率 一览表	283

第一章 在长崎发现与上海东洋庄 有关的资料群

1982年以来,从日本长崎市新地镇华商泰益号的几间仓库的废墟里,发现了在日华侨商社的庞大的商务资料群,引起东亚华侨界、华侨史研究者以及日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些资料由泰益号店主陈世望的后裔陈东华,代表其家族赠献给长崎市立博物馆。当时,在日本国立宫崎大学任教的市川信爱教授,率先向日本文部省申请科研助成金,带领学生等,对第一次开箱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分类和复印。1989年,市川信爱教授调任日本九州国际大学以后,组织日本国内的学者、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以此资料为素材,根据泰益号与台湾、上海、厦门、大连等大商埠的贸易网络,划地区展开分担研究。这一国际学术合作研究,曾经多次获得日本文部省的科学的研究助成基金的资助。

按长崎泰益号贸易网络所覆盖的大商埠展开的分担研究,都是以各自地域的相关资料,特别是以该地域的有关商号寄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为基础而进行的。笔者主要分担上海地区的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

其实,所谓上海地区的相关资料,其绝大多数即是当年上海东洋庄所属的商号,写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1989年9月,市川信爱教授把装在5大纸箱的这类资料邮寄给笔者。这就是笔者研究上海东洋庄,特别是研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缘起。

但是,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不是上海地区

的孤立的商业现象。它不仅涉及到中介商长崎泰益号、进口商台湾各商号,而且涉及到转运港关门港(日本下关港、门司港)的海运公司和港运公司;在抵制日货期间,还涉及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抵制日货期间,长崎泰益号中介的一部分中药材经过香港运往台湾)。因此,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业活动,处在长崎泰益号的整个贸易网络之中。主要由于这个缘故,笔者自 1991 年至 1997 年应邀留日,在北九州大学、九州国际大学从事合作研究,进而在九州大学大学院一边攻读博士后期课程国际社会文化专业,一边以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专题为中心,分析、研究泰益号的上海地区、台湾地区、关门地区的有关资料。

以下,就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及这些资料对于上海东洋庄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药材东洋庄研究的作用进行分析与概括。

第一节 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及其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以来,从长崎市新地镇发现的华侨商社泰益号等的资料,不是零星的、孤立的资料,而是由密切联系、主次分明的若干部分组成的横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的有关商社贸易史料的群体。本节着重分析这一商务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及其特征。

一、长崎泰益号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及其复杂性

长崎泰益号资料是包括关于旅居长崎的几家华侨商社的庞大商业文书资料群。以长崎泰益号总店为中心的该商业文书资料群的构成状况,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进行观察。

从纵的方向看,该文书资料群包括长崎泰益号总店的文书资料,其前身泰昌和记、泰昌永记、泰昌振记等的资料,及其下关分店的文书资料。从横的方向看,该文书资料群包括长崎泰益号的文书资料,与泰益号经营者具有地缘的同乡关系和具有血缘的同宗关系的振成号、鼎大号、和昌号、丰泰号等旅居长崎的其他华侨商

社的文书资料，以及关于长崎华侨商业以外活动的文书资料。因此，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具有广狭两义。

1. 狹义的长崎泰益号資料

所谓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单指该商社自 1901 年开业至 40 年代前期停业的现存文书资料。从第一次开箱清点的状况看，其中有长崎泰益号原始帳簿 27 种、822 册，辅助帳簿 14 种、393 册，装订成册的通信原稿 11 种、285 册。

在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中占最大比率的，是各地贸易伙伴寄给该商社的商务信函及其附件。第一次开箱清点并整理的信件有 17000 件^①。未整理和清点的信函还有较大的数量；据抽样调查，约有 25000 件。两者相加，其总数将超过 42000 件^②。

2. 广义的长崎泰益号資料

所谓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不仅包括前述的文书资料，而且包括该商社在神户的姐妹店泰益洋行的现存文书资料，还包括该商社店主陈世望在长崎的同族、同帮所经营的 13 家华侨商社的现存文书资料。例如，长崎泰益号前身泰昌号（包括泰昌和记、泰昌永记、泰昌振记等）的帳簿、信函等 158 件，神户泰益洋行的帳簿、信函等 90 件，振成号、鼎大号、和昌号、丰泰号、和衷号、兴泰记、东源成记、乾元保安公司等长崎其他华侨商社的信函等 210 封，都属于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

此外，广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还包括以长崎华侨社会的领袖陈世望为中心的福建会馆等长崎华侨社团及华侨学校、唐寺等现存文书资料。例如，福建会所、福建会联合会、福建会馆、福建长生会等长崎福建华侨组织的信函 45 封、长崎华侨创办的时中小学等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文献、教科书、参考书 472 件，有关福济寺、悟真寺等宗教活动的文献 85 件，有关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领事馆的文献 3 件，还有规约、地图等 38 件^③。

以上说明，长崎泰益号資料群不仅规模极其庞大，而且其构成

非常富于多样性；其内容虽然以商业买卖为中心，但是还广泛地涉及到社会、教育、宗教乃至政治等各个领域。还有，长崎其他许多华侨商社的信函、长崎华侨社会各方面的文献都集中到泰益号，委托其管理，这说明泰益号及其店主陈世望在当时长崎华侨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享有崇高声望。

通过分析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的构成状况及其数量可以发现，狭义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占长崎泰益号现存文书资料总数的90%以上，是该文书资料群的主体。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所说的长崎泰益号资料，主要指狭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而这狭义的长崎泰益号资料的1/3，与上海东洋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上述相关资料证实了上海东洋庄大致可以细分为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丝绸织品东洋庄、杂货东洋庄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海产品东洋庄和中药材东洋庄。

属于海产品东洋庄的有近20家商号，其在习惯上又分为北市号和南市号。前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北海道的函馆输入；后者所经营的海产品，主要从长崎、横滨、神户、大阪输入。长崎泰益号与神户泰益洋行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属于南市号。

中药材东洋庄，就规模而言，比海产品东洋庄小，但其成员却比较多，其中专业的药行有20多家，洋行有2至3家，兼业的商号有7至8家，共有30多家。中药材的消费者除了在日本的部分华侨华人外，主要是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的居民。但是，由于税收关系，药材不是从上海直接运往台湾，而是绕道长崎或门司，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上海→长崎(或门司)→台湾间三角形的中药材贸易途径，即笔者所创用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是这一销路的起点，台湾中药材进口商及其零售店是这一销路的终点，长崎泰益号是这一销路的中介。

二、长崎泰益号书信资料的特色及其读解的困难

第一次开箱清点的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主要可以分为经营

帐簿和商务信件两大类。

从总体的角度观察,经营帐簿还处于未整理的状态。但是,根据抽样调查,经营帐簿大体上包括原始帐簿(进货帐的草稿和出货帐的草稿等)、转记帐簿、决算帐簿三种。对此,市川信爱教授曾经这样指出:“帐簿本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有大中小三种。”^④“每页中央印有一根红色横线,把页面分割上下二栏。记帐采用纵书方式。帐簿按习惯在每年一月五日所谓财神日更换。帐簿中的年代用干支表示,数量混用汉数字、简略汉数字、苏州码字等记载。日本的货币单位‘円’,往往被写作‘元’……”^⑤。

当时,台湾地区和我国大陆的通货制度也不同。在曾经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使用的是日币。而我国大陆流通的主要还是银货,其单位除了银两的“两”外,就是银元的“元”。把日币单位“円”写为“元”,就与我国大陆的货币单位混同。这是查阅以我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主要贸易对象的长崎泰益号帐簿的一大难题。还有,汉数字、简略汉数字、苏州码字等的混用,也给根据帐簿统计贸易数据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但是,事实上,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里不仅也存在上述同样的难题,而且还出现更为复杂,更为难解的其他难题。

以下,主要以读解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的商务信件,特别是以读解上海中药材出口商、泰益号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的商务信函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题为例加以说明。

1. 难解的文体与难辨的字体

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多半是小型企业,不设专职的文书,商务信函都由帐房先生代笔。那些半桶水的帐房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卖弄自己的风骚,无不在文体与字体上摆弄花样。

汉文的近代文体与古代文体的混用,是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独

具的文体特色。开头、结尾无不搬用古代文言字句，而中间部分则是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的近代文体。所有的信件都是用非常潦草字体写的。似乎越草越好，越草越有水平。并且，草写字体因出口商号、因帐房先生而异。严重而难认的草体字是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东洋庄，特别是上海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商务信件的重要特色。

难解的文体(不文不白)与难辨的字体(无规则草书)，给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的读解、分析带来许多麻烦。

多年读解这类信件的实践说明，一家出口商的信件的读解经验，不能照搬到其他出口商的信件的读解上。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花费了多年时间，研究各家出口商的信函的文体与字体，分析其各自的风格，克服读解的困难，以便正确地理解信件的内容。

2. 夹杂方言、俗语、暗号

上海中药材出口商、泰益号在上海的海产品代理店的经营者，除了一部分浙江等省出生的外，主要是泰益号店主陈世望的故乡、福建省东南侧即闽南出生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给泰益号信件中经常使用故乡方言。例如，发给泰益号的上海寿康药行的1928年7月18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一句：“当即市面相夺异烈，生理全靠神速。”^⑥其中的“生理”在现代汉语的意义之一为女性的月经。但是，在当时闽南一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生理”即是“生意”(相当于日文的“商卖”)。因此，这句话应该读解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日，做生意全靠适时，不失商机。”^⑦“生意”、“做生意”是我国近现代最常见的商业用语，为商务书信所不可缺少。但是，在上海所有的出口商寄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中，都不见“生意”、“做生意”之类的词语，而只有“生理”一词。经笔者考察，当时闽南一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的“生意”一词有被当作“介意”的可能。为了避免误解，谨小慎微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和海产品代理店的帐房先生，在写信的时候，无不把这类词语远远地抛之脑后。

寄给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和海产品代理店的信件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俗语。“有余”就是其中的一例。在普通话里，“有余”一词有钱财丰富，超过需要量的意义。上海茂记号等海产品代理店写给泰益号的信件，特别是逢年过节时候写给泰益号的信件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余”两字。从字面看，这显然是贺词，意为“生财有道，年年盈余”。但是，奇怪的是，“有余”一词后面都有“几百几斤”等量词相随。所以，这个“有余”，事实上是指的是海产品鱿鱼。鱿鱼别名为“乌贼”，虽然美味可口，但外貌漆黑，兆头不佳。并且，江南一带还有“炒鱿鱼”之说。那是以鱿鱼为喻，要给人难堪，使其丢脸的意思。为了避害趋利，去凶就吉，善于献媚取宠的上海海产品代理店的帐房先生在给泰益号的信件，特别是逢年过节时候给泰益号的信件中，绝对不写“鱿鱼”两字，而用“有余”代之(在我国东南沿海，“鱿鱼”与“有余”的发音极其相近)^⑧。

笔者生在福建，长在福建，学习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对泰益号商务信件中的方言、俗语具有特殊的亲切感；但是，具体读解这些商务信件也并非易事。

泰益号商务信件中，还有极其复杂的电报密码和暗号。这是泰益号为了市场情报和竞争手段的保密，用阿拉伯数字与日语片假名混合编制、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更改的符号，其破译难度更大。

3. 混用新历与旧历

根据商务信件整理、收集贸易数据和情报，发信日期是头等重要的前提。确定发信日期方法，一是信封邮戳上的年月日，二是写信人在信笺里写的年月日。但是，笔者在整理、分析长崎泰益号的上海等地区的信件时，发现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

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的信封上盖的邮戳里，当然有新历年月日。遗憾的是，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大部分邮戳字迹业已模糊，年月日难以辨认。并且，一部分信封遗失了，只剩有信笺；相反，一

部分信笺遗失了，空信封却存在。关于这个问题，整理泰益号的台湾地区商务信件的朱德兰女士指出：“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信笺或信封原来就遗失了，二是第一次开箱清点、分类时弄错了，使两者对不上号。”^⑩以上状况说明，很难根据邮戳判明发信日期。

另一方面，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的发信人有混用新旧历的习惯。这又给发信日期的判断造成不少困难。上海东洋庄，特别是其中的海产品东洋庄、中药材东洋庄的一部分帐房先生，在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上故意不写明确的日期，而往往写上含糊不清的春月或端月或汪月（1月）、花月（2月）、桐月或桃月或樱月（3月）、卯月或余月或梅月（4月）、蒲月（5月）、荷月或荔月（6月）、瓜月或巧月（7月）、桂月（8月）、菊月（9月）、阳月（10月）、遐月（11月）、蜡月或纳月（12月）、又月（闰月），以及念日（20日）、念一日（21日）、念二日（22日）、念三日（23日）等。不过，这些词语尽管如此模糊，但是究竟是表示旧历的，可以由此判断其发信的日期。

严重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信件只写月、日，没有标明新旧历。在当时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新旧历混用对发信方和收信方都没有什么妨害和不便。但是，时隔 60~70 年的今日，在读解这些信件，并从这些信件中收集当时贸易数据和情报的过程中，新旧历混用就变成了新旧历混乱，成为整理、读解、分析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的一大难题。

对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来说，商务信件就相当于订货单或发货单，发信日期是交易合同成立的根据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在整理、读解泰益号有关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信件的过程中，根据信件的内容和发信的顺序，把同一出口商发出的所有信件，前后有序地排列起来，尽力排除新旧历的混乱，以判断正确的发信日期，收集了其中的贸易数据和情报，编制了各出口商中药材出口的统计表。

总之，难解的文体与难辨的字体，兼用汉数字、略汉数字、苏州码字，夹杂方言、俗语、暗号，混同旧历与新历，等等，都是长崎泰益号文书资料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增加了该文书资料读解、分析的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一难题，才能正确地理解、把握泰益号文书资料的内容，收集、整理其中的贸易数据，发挥其在上海东洋庄研究中的应有作用。

第二节 泰益号商务信件在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中的作用

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主要指各地贸易对象寄给长崎泰益号总店的商务信件及其附件如本单（日语为“原价表”）、海运单（日语为“船荷证券”）、运费清单（日语为“运赁请求书”）等。根据初步统计，长崎泰益号在我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菲律宾、朝鲜半岛、俄罗斯的海参崴、日本本土的贸易对象，多达 4099 家；来自这些贸易对象的商务信件数量之庞大，可想而知^⑩。

主要以海产品出口起家的长崎泰益号，把海产品运至上海批发，回程把中药材运到门司港或长崎港转口台湾。因此，当年上海中药材出口商写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及泰益号有关的经营帐簿，不仅是研究海产品东洋庄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中药材东洋庄的唯一可靠的资料。笔者自 1989 年以来，通过分析这其中的大部分资料，写出关于上海东洋庄，特别是关于上海、长崎、台湾之间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论文 20 多篇，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广泛关注。拙书《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就是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概括、改写、补充而成的。

半个世纪前，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的情报联络手段，主要有书信、电话、电报三种。为有利于保密和节约成本，实际上利用电话、电报的场合很少，而经常、普遍使用的是商务书信形式。这就是 1982 年以来所发现的泰益号贸

易对象的商务信件数量大,特别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数量大的最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本节首先着重就长崎泰益号商务信件在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运营中发挥的重大作用略作分析。

其一,贸易伙伴间的交易协商作用。

当时,日本政府以高进口关税政策阻碍了殖民地的台湾与上海之间的中药材直接贸易,给沪台双方有关的商业界造成了很大损失。台湾民众对价格比较低、毒副作用比较小、具有长期服用习惯和经验的祖国出产的中药材富有感情,喜欢服用。台湾的有关进口商社与上海的有关出口商社在其相互往来的商务信件中,探讨通过什么渠道,采用什么方式,使台湾海峡两岸间的中药材贸易得以重新开展。可以想象,这种信件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上海出口商社直接寄给台湾进口商社的信件、台湾进口商社直接寄给上海出口商社的信件都已散失。幸好,两者寄给中介商长崎泰益号的信件基本得以保存。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当时沪台中药材进出口商社关于药材贸易商谈的概况。

其二,相当于订货单、发货单的作用。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与台湾中药材进口商社不能直接进行订货或发货,这一商业过程必须通过中介商长崎泰益号得以完成。关于其背景,黑木国泰教授这样指出:泰益号店主“陈世望在长崎开展贸易活动的时期,正好是台湾被纳入日本版图,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时期。当时,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与台湾间的不合理的关税政策,使长崎在台湾海峡两岸贸易中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逃避关税,台湾所需要的中国大陆的中药材必须经过长崎的中介输入台湾,才可能赢利”^⑩。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寄给长崎泰益号的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商务信件和台湾中药材进口商

社的商务信件，事实上相当于订货单或发货单。大部分的信件里明确地记载着商品的名称、数量、发货日期、托运方式、托运船舶等。虽然由于税金的关系，单价和货款一般不直接写在信件里，而记载在随信的附件本单和清单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幸存的商务信件及其附件，了解当时台湾海峡两岸有关商社进出口中药材过程中的订货、发货的具体情况。

其三，收集经济情报、政治情报的作用。

在日华侨商社长崎泰益号是在中国国内政治动乱、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下，开展以祖国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国际贸易，并开拓了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与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做生意，发挥了台湾海峡两岸中药材贸易的桥梁作用的。为了及时掌握各种信息，顺利运营其贸易活动，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泰益号店主陈世望希望上海贸易伙伴及时、广泛地收集中国国内的经济情报、政治情报。上海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药材东洋庄的成员，如鼎成药行、鼎成泰记药行、松茂药行、同康药行、协成元记药行以及兼营中药材出口的茂记号、德大洋行等的经营者，心领神会，投其所好，在给泰益号的商务信件中不仅及时地报告我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市场动向，而且详细地报告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抵制日货运动等军事、政治情报。

其四，交流感情的作用。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及以其为起点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实际上是以泰益号店主陈世望为中心的血缘、地缘、人缘等人际关系而形成的横跨日本海、中国海、南海的华侨商业网络的一部分。经济上的利益和人际关系上的感情，是支撑该网络的两根大柱。在迂回曲折的中药材三角形销路上，货物的及时转运和适当的关税对策（减少税金），是上海中药材东洋庄出口商的出口贸易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而这一关键掌握在泰益号的经营者手中。正因为如此，中药材东洋庄各成员无不千方百计地讨好泰益号的经营者，以